春风万里度玉关
——敦煌的地理、气候和农业开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敦煌地处亚洲大陆的中部、河西走廊的西端，位于我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东缘，北边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南面是巍峨的祁连山，属于干旱的沙漠性气候，年降雨量很少，平均只有 39.9 毫米。但由于敦煌紧靠祁连山，以祁连山雪水为源的党河、宕泉河、疏勒河等流经敦煌，有些虽是季节河，却给敦煌带来了丰富的地下水，可用于浇灌农田。另外，敦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有着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作用决定了它很古以来就是人类选择的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栖息地之一。

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考古和发掘资料证实，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位于这个走廊西端的敦煌，对广袤的西域及更远的外部世界来说，它是了解和进入世界东方中华文明的前哨和窗口；而对于独立的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孕育的中华文明来说，它又是将探索的触角伸向西方的第一站。“敦煌”、“阳关”、“玉门关”这些地名，不仅是一个地名，而且是古代中原汉族人的一个心理的界线。

一般认为，在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置郡前，敦煌只是一个优良的牧场，是以广袤的西域等地为杀伐征战舞台的游牧民族争夺的战场。其实，敦煌也有着很早的农业开发。

考古证实，敦煌的西面和东面都是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1985、1986 年在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发现的小麦、大麦、高粱、粟以及稷等重要农作物，距今

5000 年左右；紧靠玉门的火烧沟遗址表明，人类很早就已选择在类似的沙漠绿洲居住；早在 4000 年前左右，与敦煌毗邻的新疆已经有了农业生产；距今 2960～2800 年左右的哈密地区的古墓中，就出土了小米饼和青稞穗，还大量出土了粟、黍、豆类作物和胡麻、小麦等。敦煌位于这几个地区之间，迄今已发现数处古人类活动过的遗迹，比如古阳关、西土沟等，属于玉门火烧沟文化类型，应该也有早期人类居住和农业开发的历史才对。确实，聪明的早期人类没有放弃如此优良的生存环境。在敦煌采集和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镰等工具说明，敦煌也是古人类生活的地区之一。而敦煌的农业开发，应该不比上述地区晚，在敦煌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磨即是证明。

在敦煌的阳关曾先后出土、发现了数具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石磨器（两具存阳关陈列馆，一具存敦煌博物馆，一具存敦煌研究院），西土沟也出土了一具碾磨盘和磨棒，尺寸为 36 厘米、19 厘米、10.5 厘米。临近敦煌的安西，也有新石器时代的石磨器出土。石磨器出现如此之多，有力地说明当时的敦煌地区已有相对发达的农业种植。

甘肃的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不少同时代和同类型的石制粮食加工工具。如酒泉、武威等地。武威皇娘娘台曾出土了一件属于齐家文化的红沙岩的碾磨盘和石棒，磨盘部分为椭圆形，长 37 厘米，其形状、大小与敦煌出土的完全一致，说明整个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历史时代的一致性。

敦煌干旱少雨，但地下水丰富，又有流经的河流

可资灌溉，是典型的沙漠绿洲农业区，这就决定了这里的农业栽培特点与当时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基本一致，即主要以生产小麦、糜、谷、豆等为主。敦煌有史料记载的历史从汉代开始，这时，敦煌即已有农业种植。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敦煌郡后，敦煌的人口急剧增加，已有像样的农业开发，敦煌汉简中，记载有粟、穬麦、苜蓿、糜、稷、麦等粮食作物，在出土汉简的地方，还发现了大量的糜子、谷子、青稞、大麦、小麦、豌豆等实物，虽然有一些可能是由内地运往敦煌的军粮，但不排除部分出产于敦煌本地的可能。因为从汉文帝时起，就实行“徙民实边”的政策。霍去病攻占敦煌后，不断有中原汉族移居敦煌，他们带去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栽培技术和农作物品种这是毫无疑问的。

人类食物来源经历了采集、狩猎、牧养、种植的过程。伴随着农业的开发、或者早于农业开发的是早期敦煌人的狩猎和畜牧。因为敦煌周围是优良的牧场，历来就是游牧民族争夺的战场，那些我们熟悉的羌戎、乌孙人、月氏人、匈奴人等在敦煌周围上演了一幕幕“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话剧。从汉到唐五代，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和狩猎仍是敦煌人获取食物原料的重要途径。

因此，远古的敦煌并不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并不是古人畏叹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而是一块肥美的适宜农业种植的良田沃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活的乐土，几千年前，这儿就有了人类的足迹，“万里春风度玉关”，先民开发的春风早就曾沐浴过这

儿，各少数民族和后来的汉族在这里创造了堪称发达的农业。这一切，是后来敦煌饮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大漠嵌绿洲，麦黍遍地稠
——敦煌的粮食作物

唐五代到宋时期，敦煌人的粮食作物主要有麦类、粟、黍、粳米和豆类。下面依次叙述之。

一、麦类

我国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为粟、黍和稻，它们作为主食曾统治了我国先民的食盘几千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食物以粟、黍和稻为主，黄河流域则以粟和黍为主。后来，麦类、豆类等农作物相继出现，逐渐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我国也是小麦的原产地之一，专家指出，甚至我国的新疆也可能是小麦的原产地之一，这就是说，敦煌以及整个河西走廊栽培小麦的历史也较早。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早于内地的距今约 5000 年前的小麦和大麦炭化颗粒，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小麦较内地更早成为敦煌人的主食和栽培最多的农作物就在情理之中了。从敦煌文献中可知，当时栽培的麦类品种已较多。

1. 小麦

五代至宋时，小麦无疑是敦煌人最主要的农作物栽培品种，不仅在各种账籍中出现的次数为多，而且数量也居首位，这说明当时敦煌人的食物构成中，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麦已渐次取代粟成为人们的主食。

小麦在食用前必须进行加工，除了食用部分原粮即“粒食”外，大量的要磨成面粉食用。小麦从“粒食”到加工成“粉”而后食用，是小麦由“粗粮”转为细粮、到最后取代粟成为人们主食的关键。敦煌人的小麦加工品有白面、粗面、连麸面和麸子，与今天河西人的叫法几乎相同。白面又叫“头面”，河西人称石磨第一、二遍加工的面粉为“头茬面”，“头面”只不过是其简称，“头面”一般制作比较高级的食物，像各种炸食、馄饨及其他精美主食。“连麸面”又简称“连面”，是磨到最后经过粗罗隔除麸子的面。“粗面”又叫“黑面”，颗粒较粗，做出来的食物颜色较黑，河西人叫“大麸面”。根据一些卷子记载，敦煌的“粗面”可能是没有经过“罗”这道加工程序的面，也就是没有隔除麸皮的面。这是粮食尚不充足时的一种加工法。“粗面”和“连麸面”属于粗粮，寺院里一般由当寺女人和地位低下的寺僧在劳作时食用，还充作寺院的“牧子”等的口粮。连麸面和粗面也可做成胡饼或蒸饼，甚至也可以制作馄饨。小麦加工的最后剩余品为麸皮，一般作牲畜的饲料和用来“卧醋”、造酒、造酱，这方面的记载也比较多。小麦还有一种加工品，这就是磨去皮后做麦饭和麦粥。

古人最初加工小麦是去皮或压碎，然后做麦饭和麦粥。上个世纪初，斯坦因曾在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墩遗址发现了一座粮库，内有一些煮过的麦片粥[1],可证当时的人们加工麦子的方法是将麦子压碎后食用。

据史书记载，到南北朝时期，内地食用小麦时，还以麦饭和麦粥为主。敦煌虽然食用各种麦面饼比内地要普遍较早，但至少在初唐的敦煌文献中，还有食用麦饭和麦粥的记录。小麦也可以用来酿酒，用小麦所酿的酒因为度数较高和颜色纯净，因而深受敦煌人的喜爱 。

2. 青稞

青稞在敦煌文献中写作“青麦”，也是敦煌人栽培的麦类农作物之一。文献中没有记载如何食用青稞，但有用它来酿酒的记录。有一件初唐文书《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簿计会》载每户的粮食中都有青麦，这显然是作为口粮食用的。联系到敦煌曾被吐蕃人统治过半个多世纪，吐蕃人食用青稞的习惯肯定会影响到敦煌人。饮用青稞酒也是吐蕃人的传统。P. 2763Vc 是一件吐蕃统治初期沙州仓曹分配给宴设厨造酒原料的文书，其中记载所分配的原料中，青稞达到了 18石之多。

3. 大麦

大麦是中国北方早就种植的一个粮食品种，更是河西走廊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汉简中就有关于“大麦”的记载。在敦煌，大麦只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文献中出现，P. 2763Vd 《午年（公元 790?）仓曹某某等牒》有：“壹百壹拾陆硕陆斗柒胜大麦”； P. 2654《巳年（公元 789?）沙州仓曹会计牒》有：“玖拾柒硕捌斗玖胜大麦”；P. 3446V 有：“壹拾捌硕柒斗捌胜大麦……壹拾肆硕陆斗捌胜大麦”等。说明大麦也为当时敦煌种植和食用的粮食之一，也可用来加工成

饲料。吐蕃统治敦煌后大量出现大麦，这有可能和吐蕃人对大麦的需求较多有关，这就是大麦比较适合作牲畜的饲料。归义军时期并不是不再种植大麦，而是大麦的名称发生了变化。

4. 罗麦

敦煌文书中多次出现了一种写作“罗麦”的粮食作物，“罗麦”即“裸麦”、“倮麦”、“落麦”，同音异写，又叫“米麦”、“元麦”、“穬麦”。S. 4534《新修本草》又写作“廣麦”，即“穬麦”。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籴穬”。李善注曰：“大麦之无皮毛者曰穬”。据《齐民要术》：“陶隐居〈本草〉云：‘大麦为五谷长。’即今倮麦也。一名𪏭麦，似穬麦，唯无皮耳。穬麦此是今马食者。然则大穬二麦种别名异，而世人以为一物，谬矣。按世有落麦者秃芒是也。又有春种穬麦也。”据《辞海》，穬麦是大麦的一个变种。因此可知，罗麦或曰裸麦，即大麦之无芒者。

关于“罗麦”，大量出现在“磑课历”中，而这些“磑课历”均出自吐蕃统治时期，这个时期，属于大麦类的裸麦被大量种植，成为当时人们的食物和牲畜饲料。

清道光年间所修的《敦煌县志》中，记载有当时栽培的几十种农作物，其中除了大麦、青稞外，还有一种叫“稞麦”，说明当时人对青稞、大麦和稞麦是有区别的。我疑“稞麦”即“裸麦”的讹误。因而，敦煌当时的裸麦、青麦应当是两个品种。

从文献当中看，青稞和裸麦栽培得较少，属于粗

粮，所加工成的食物一般由妇女、地位低下的僧侣和役使人员食用。另外还可以酿酒，可以加工成饲料。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用罗麦和青稞加工“ 踏 ”的记载。“ 踏 ”即饲料。

5. 荞麦

荞麦本不属于麦类，但因为叫“ 荞麦 ”，故也列入麦类。荞麦在文献中多写作“ 燋麦 ”，主要出现在吐蕃统治初期的文书中，归义军时期文献未见记载。我们分析，荞麦并非以后没有种植，而是因为一是产量低，种植面积少；二是因为是杂粮，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献多是寺院及归义军上层的面破历等，故没有荞麦的记载。按河西人现在的食法，荞麦一般磨成面，吃搅团、削面，也可以掺上其他面蒸成杂面花卷，另外，荞麦凉粉也是河西人喜爱的夏季食物之一。

二、粟、黍和粳米

1. 粟

粟又叫“ 谷子 ”，是数量仅次于小麦的粮食品种，也是早先最主要的粮食品种。粟是早期敦煌人的主食，栽培的最多，但到了晚唐五代至宋时，小麦取代了粟的地位而成为敦煌人的主食，粟的种植逐渐减少。粟除了去掉壳加工成小米外，也可以加工成面粉食用。许多卷子中都有粟面或谷面的记载。粟虽然从敦煌人的主食地位上退了下来，但产量仍是仅次于小麦的农作物，寺院文书中大量的关于粟的记载都是将粟用来酿酒和换酒的记录，少数才磨成面粉分配给为寺院服役的寺户或“ 牧子 ”、“ 恩子 ”、“ 园子 ”及当寺女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敦煌的小麦产量较

多，已能满足人们日常主食口粮需要，寺院的粟多用来酿酒，以应付日常对酒大量的消耗，这与敦煌寺院内有富足的粮食有关，因为寺院的大部分僧人平时在家，只有少数执事僧和主持等住在寺院，而寺院有自己的田地收入，有施主和信徒的施入，有高利贷的利息收入等，收入的粮食少数僧人吃用不完，只有用来酿酒。不管怎样，敦煌人、特别是僧人用粟来做某种食物的记录不多。

当然，小米毕竟是敦煌人的主食之一。吐蕃时期的藏文文书记载，“小米”曾作为当时吐蕃官员的俸禄。还有一些开支“谷面”的记载。根据河西人的饮食习惯，小米一般用来做小米饭、馓饭和煮小米粥，谷面则用来做烫面糕和疙瘩，烫面糕和疙瘩河西人也称作“砣砣”，制作方法是将烫好后的面放在碗中蒸熟，或用手将烫好的面团成银元大小的砣砣，煮熟后食用。经过开水烫后，谷面糕和疙瘩有一点甜味。敦煌文献中所载的食物中有一种称做“糕糜”的品种，当是以谷面或糜面为原料做成的。甚至在文献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用粟面制作“煎馉饦”的事例。具体如何，不得而知。

2. 黍

河西俗语称做“糜子”，也是我国栽培最早的农作物之一。糜子的加工品为黄米，可用来蒸饭或煮粥，也可用来酿酒。糜子在敦煌文献中往往写作“床”。糜在敦煌文献中出现数量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种植的较少。敦煌食物中的“糕糜”，有时又写作“糕𬬸”，可知就是以糜子为原料制作

的。

3. 粳米

稻子在我国南方栽培历史很早。在人们的观念中，它是江南水乡的农作物，但其栽培、耕作方法很早就传入了我国西部。唐代的高昌就有稻米种植，而敦煌也有粳米种植，可证稻米的栽培正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各地的。稻作为一种南方的农作物在沙漠绿洲敦煌的种植，说明敦煌人在农业栽培上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有创造力的一次实践，也是敦煌农业科技的一项惊人成就，是许许多多南稻北移梦想实践的一次成功范例。

从文献记载看，粳米在敦煌种植不多，只有在重大节日和重要的仪式上才能见到“米”的开支，而且数量较少，几乎都是一斗多一点。敦煌虽然种植稻米成功，但由于稻米对水、肥及气候和耕作技术的要求较高，在敦煌出产不是很多。我们从一件吐蕃统治时期的文书中也发现，粳米作为一种种植较少的稀有品，大部分由贵族和官员食用；在敦煌藏文文书 P. t. 1205 《玉莽赞向内相杰波赞桑呈递的禀帖》中，载有向内相“献上的礼品有当地出产的大米四百斗及水果冬梨九万筐”，说明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所产大部分粳米都被镇守敦煌的吐蕃官员作为贡品送到了吐蕃王廷。因此，连寺院都难得吃一次粳米饭，何况普通百姓。

在 P. 3745 《三月廿八日荣小食纳付油面柴食饭等数》中，还记载有一种叫“苏米”的粮食，它与粳米、草莳等登录在一起：“苏米半升”，“苏米一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抄”。“苏米”与“粟米”虽然音同，但并非是“粟米”，因为粟是敦煌当地种植和食用较多的作物，也是那些记账者比较熟悉的字，几乎没有发现有抄写错误或写白的情况，因此，“苏米”有可能是从中原内地贸易来的一种稻米。

三、豆类

豆也称为“菽”，是我国栽培较早的农作物，也为敦煌人栽培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而且是种类最多的粮食品种。从文献记录看，有豌豆、荜豆、豇豆、小豆子、大豆、黑豆等。

1. 豌豆

豌豆是敦煌种植最多的豆类农作物，在文书中出现的次数较多，而且数量也很大，仅次于小麦、粟，尤其在敦煌早期官方文书中记载很多。

豌豆，今天的河西地区仍叫这个名称，也称作“青豆”、“圆豆”，有白、青两种。最早产于地中海，很早就传入中国，汉时已在敦煌出现，我们前举在敦煌发现汉简的地方，就曾出土过豌豆。唐宋时在河西地区大量种植，因富含蛋白质，是上乘的牲畜饲料，而在饥馑年份或粮食歉收时，也用作人的食物。许多寺院文书中都有用豌豆喂乏羊和其他牲畜的记录。如 P. 2032V 《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有“豆八斗，与牧羊人喂瘦羊用”，“豆三硕，喂瘦羊用”，“豆三斗，喂瘦羊用；豆一斗，碴蹅纳官用”，“豆贰斗，蹅后件喂乏羊用”的记载。“蹅”指豆子或其他粮食碾碎加工成的饲料。

寺院的豆子也有充作食物的，如 S. 6233Va《年代不明（公元 9 世纪前期）付诸色斛斗破历》：“十一日，付黑女豆二斗，充粮食”，“同日，付黑女豆二斗，充粮食”，本件文献中的“豆”即豌豆，“黑女”是一名寺院的役使人员，因此可以看出，豆子即使充作粮食，也由女人或役使人员来食用，显然被当作粗粮。

2. 荜豆

又写作“蓖豆”，也是出现于文献的豆类作物，在一件关于僧人死亡的文书中记载，荜豆用来煮粥，其他文书中荜豆虽出现得较多，但文书没有提供它的食用法。

关于荜豆，《本草纲目》曰：“崔寔《四民月令》作跸豆，即豌豆也。”但在同一件敦煌文书中，豌豆与荜豆、豆却多次同时出现，说明二者在当时是有区别的。联系到豌豆也有好多品种，我们分析，荜豆是豌豆的一种，《齐民要术》中也有载，看来也是当时在中原大量种植的一个豆类品种，比起一般的豌豆要好，可以用作煮粥。而一般的豌豆多作牲畜的饲料。

3. 黑豆

大豆的一个品种，在敦煌也有种植，有一条资料记载为“登高日”换了一些黑豆。为何要在九月九日重阳节换黑豆呢？这应当和九月九日吃糕的习俗有关。黑豆是用来制作豆糕的。

另外，在 S. 3836 《类书》中，有“黑豆酱”的名词，说明当时黑豆也用来做酱。

4. 绿豆

绿豆属于小豆，只在一件文书中发现有载，而这件藏在俄国的文书有可能是吐鲁番文书，虽然如此，当时的敦煌，应该已有绿豆种植，因为在临近的吐鲁番及中原都大量种植绿豆，且敦煌种植有其他小豆。

5. 大豆

除了 S. 6061 中有“四斗大豆”与豌豆等并列外，别无它载。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敦煌所称的“大豆”，有可能指的是现今的蚕豆。因为河西人至今都将蚕豆称做“大豆”，而将真正的大豆称作“黄豆”或“黑豆”。而据考古发掘，在临近敦煌的吐鲁番等地，在高昌时期即有蚕豆和黑豆的种植[2]。那么，敦煌种植蚕豆就有可能。

除了以上记载的豆类外，文献中还记载了豇豆、小豆子、雁豆等豆类品种。需要说明的是，它们都出自寺院的账籍文书当中，而出自一些蒙书类作品中的豆类还有一些。

《齐民要术》卷二说：“今世大豆有白黑二种，及长稍牛践之名，小豆有绿赤白三种。黄高丽豆、燕豆、毕豆，大豆类也；豌豆、豇豆、莹豆，小豆类也。”由此可知，“雁豆”即“燕豆”，是大豆的一种。

除以上外，在 S. 5039 中，有“麦一斗，买草醃子用”，似乎也是一种豆子，但不知为何种豆子。

清道光年间所修的《敦煌县志》中载有蚕豆、黄豆、豇豆、小豆、扁豆、赤小豆、刀豆等豆类作物，可作当时敦煌种植豆类品种的参考。

豆是重要的蛋白来源，也是敦煌种植产量仅次于麦、粟的重要粮食作物，敦煌人种植的各种豆类作物可以做成豆糕、豆豉、酱等许多食物或调味品。文献中还出现过“豆面”的字样，可见，敦煌人也用豆子来磨面。豆子也可以用来煮粥或做其他食物。由于豆类在此时已退出了敦煌人主食的地位，在文献上记载很少，我们无法详知更多的豆类食品的情况。

生菜萝卜葱蒜韭——敦煌的蔬菜

蔬菜和瓜果是敦煌人主要的副食品。蔬菜主要有萝卜、生菜、蔓菁、葱、韭菜、葫芦以及我们前面讲过的豇豆等。

由于敦煌社会经济类文献多是寺院和归义军衙内的账籍，因此，反映的主要是寺院和归义军衙内的饮食状况，而几乎没有普通百姓生活状况的反映。比如蔬菜类，也只能从寺院和归义军的账籍上看到，尽管如此，对敦煌当时蔬菜栽培也能了解个大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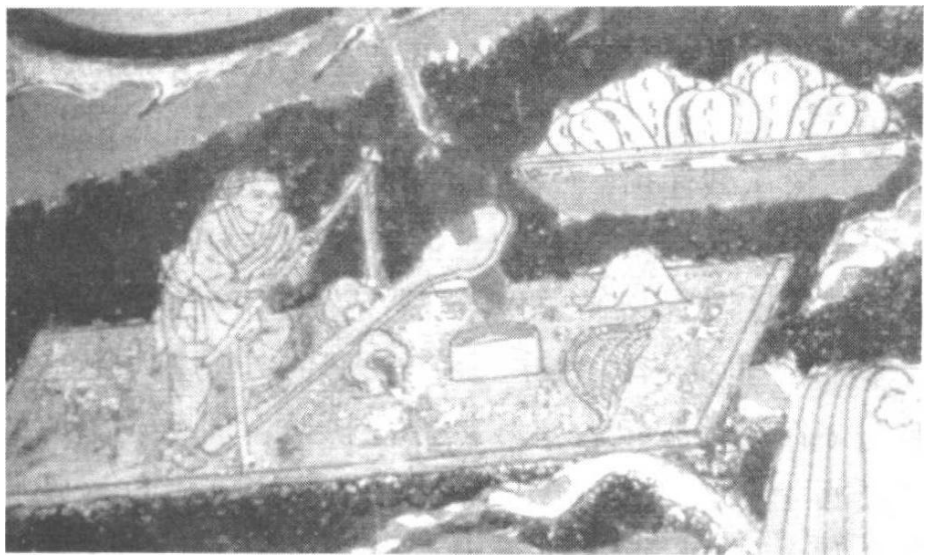
大多数蔬菜见诸于寺院的账籍，而且就是属于寺院的菜园所种植，资料反映寺院的僧人在园间从事垒葫芦架、座葱、掘葱、种韭等劳动，说明寺院自己经营菜园，种植的蔬菜除了僧人自己食用外，剩余部分也可能用于出售。管理菜园的人称做“园子”。从净土寺的情况看，因为种植蔬菜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所以“园子”是固定的管理人员，寺院负责“园子”的口粮供应。园间的日常工作当由“园子”及其

家人承担，只有一些集中的农活才由寺院派僧人前来完成，由于寺院的大部分僧人平时都住在家中，因而到寺院的菜园参加劳动，寺院要负责其食物的供应，有时还要供应一些酒。

除了寺院种植蔬菜外，敦煌可能还有以蔬菜种植为业的“专业户”。因为几件归义军衙内的文书记载，衙内曾支出酒用来从“葱户”和其他人手中换葱和萝卜。如 P. 2629 卷《年代不明归义军衙内酒破历》中载：“支董富子纳罗葡酒一斗”，“支葱户史骨子酒壹瓮”，“支葱户纳葱酒一瓮”。尚不知“葱户”与敦煌的“酒户”、“粮户”的性质有没有区别。但无论早期如何，到了后来，这些蔬菜种植者都可能成了专门的人家。

文献所记录的蔬菜品种中还有葫芦，写作“胡卢”，从其名称分析，当也从西域传来。现在河西人管所有的冬瓜、南瓜等，均称作葫芦，因此，敦煌当时的葫芦并非专指河西人称作的“吊葫芦”。榆林窟第 3 窟壁画中，就有大盆中装冬瓜的画面（图版一）。

“生菜”似乎是敦煌人常食用的一种蔬菜，在 P. 3231(11) 《癸酉年至丙子年（公元 974 至 976 年）平康乡官斋籍》中有“生菜头”等负责人，说明在较大规模的僧事活动中，“生菜”也是主要食用的蔬菜之一。关于“生菜”，《中国伊朗编》的作者劳费尔认为：“唐朝以前的作家似乎没有提‘生菜’（莴苣在北京常用的名字）或‘白苣’。”[3] 如此，则当时敦



图版一榆林窟第3窟的踏椎和冬瓜图

煌的“生菜”就是莴苣属的一种菜蔬。而“莴苣”在P. 2609《俗务要名林》中也有记载。

韭、葱、萝卜是敦煌人种植较为普遍且数量较多的蔬菜。韭和葱比较好理解。萝卜是指“胡萝卜”，还是指别的萝卜，不好下判断。在S. 1267《年代不明四月卅日上座因佛事配物谘》中记载，这次佛事活动中，给参加的僧人分配的副食是“生菜萝卜菜各一斗，椒姜各多少”；在另一件S. 4687《乾元寺董法律等斋饼历》中，给参加法事的僧人也是“每人菁一升，萝卜根十个”。僧人在集中进行各种佛事活动时，可以就着些萝卜、生菜等吃分配的饼。“菁”与“蔓菁”是两样东西。“蔓菁”即我们熟悉的“芜菁”。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载：“芜菁，《释名》：蔓菁。《藏器》曰：芜菁，北人名蔓菁，今并汾河间烧食其根，呼为芜根，犹是芜菁之号。芜菁，南北之通称也，塞北、河西种者，名九英蔓菁，亦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